



秋叶开始泛黄的时候，我作为广东省委主题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的副组长，到湛江、茂名、阳江三个地市开展工作。在茂名，我被当地烈士李卡狱中写下的遗书震撼了——

朋友：

当白色的恐怖正在蔓延着，死亡之魔在狂吼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凶信，而是一个喜兆，你接到应该为此而快乐，因为任何魔力明知是消灭不了我们，而自己的心正在发慌，又故意装出残酷的面子，干尽伤天害理的事。

我走了，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笔迹，也许你为此而难过。

我们这一代就是施肥的一代，用自己的血灌溉快将实现的乐园，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一切幸福，这就是我们一代的任务，是光荣不过的事业，死就是为了这，而生者亦是生的努力方向。几多英雄勇士为此而流血，抛出自己的头颅，我不过是大海中一滴水，平原的一株草，大海无干旱之日，烈火亦无烧尽野草之时。

我走了，太阳我常不走，你跟着它呀！永远地跟着它呀！

朋友，努力！天一亮，你就会看见太阳的微笑。

愿你
幸福愉快

卡 留笔
旧历闰七月初三
(1949年8月25日)

真是蹈厉之志，大节不夺！李卡，一个年轻的盗火者，牺牲时年仅27岁。是什么让他把三尺之躯捻成了火把？又是什么让他如此乐观、向上、大无畏？

我被情感驱驰着，千方百计找到了他的资料，特别是鲜为人知的“狱中书简”。粗略统计，仅狱中所作就有23份，包括诗1首，信19封，日记3篇。透过文字的光，必须说，我窥见了一个平凡而又高尚的靈魂。

用理想为人生壮行 以信仰向人民谢幕

——读茂名烈士李卡“狱中书简”

□ 李宜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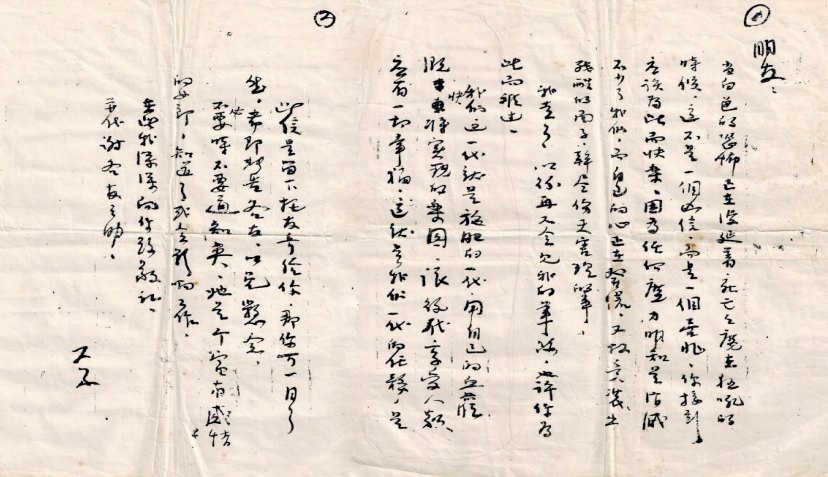
不消说，目下我已能大致描摹出李卡起初的样子。一个粤西的少年，瘦削而深思，早早接触了革命思想，社会沉沦，现实黑暗，即便身处深山，也难以平静。他宣传进步思想，号召人们团结抗日，并奋身抗争学校当局。

抗战胜利后，李卡考上了广州的大学，后来又在《建国日报》当记者。他胸怀理想，以笔为戈，写了不少战斗诗文，在《建国日报》的副刊和香港《华商报》发表。

李卡的诗，锵金铿玉，富寓哲思。比如这首《我有一支胡笳》：我有一支胡笳，从战地带回了家。春天，在田野里，在闪烁的水面上，我和青蛙、虾蟆一齐歌唱。秋天，在河边，在拂着的榛树中，我和流水、夜莺一起哀伤。我有一支胡笳，可是我不是一个音乐家……我有欢乐也有忧伤，我爱土地也爱海洋。

李卡的文，磊落豪横，轻率锐兵。比如，他写《谁叫你失学》：惟是在抗战胜利了的今天，竟然有些教育家，不知廉耻，大发其招生简章，假借某院长某部长某将军做校董来招生，到了水落石出，奉令停办的时候，竟不发还学费等无耻的行为，实为中国教育界最大的耻辱，亦即是中国的青年学生最大的痛苦。一面是教育家大发其“复员财”，一面是一群莘莘学子走进了失学的迷途去，嗚呼中国教育！

文能提笔作赋，武能上马杀敌



——如果在古代，李卡就是一个标准的儒将。1947年，他被派往韶关粤赣先遣支队，任司令部参谋，后又调往曲南游击大队，任武工队队长。他的枪法极准，随手一挥，鸟雀落地，百发百中。因为受过良好教育——还曾被地下学联送到香港达德学院学习，他指挥作战履机乘变，又注意攻心为上，很快就打了好几场胜仗。一时间，他成了敌人心中神秘而又可怕的人物。

不过，那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名，只晓得他的绰号——“古怪李”。那是因为他生性诙谐，有次晚会边演边唱了当时颇为流行的《古怪歌》，乐得大家前俯后仰。从此，“古怪李”不胫而走。

他是1949年1月14日晚上被捕的，在一个山村的草房里。他从梦

中惊醒，立即将文件撕毁，塞到嘴里吞下去。敌兵见状，举起枪托猛击其胸……

即便进了芙蓉山监狱，李卡也还是李卡。一方面，他认为“我的被捕及死都是意料中的事，是不可怕，而怕也怕不来”，便团结狱友，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，直斥“滚开吧——你，既不滚开又不投降，我们有权命令，太阳消灭你”；一方面，虽半饭难吃、胸部受伤，仍劝朋友“不必再买什么补药，我不应有此享受，实在比我更辛苦的朋友还有，前方的和后方的”“补药我还没动，朋友们又要打游击，为了经济计，存着它，我也想送去给他们，他们亦在营养不足中工作呀”，把补药让病友“分甘同享”了。

如上，如斯，李卡已不愧为一个英勇的人。但视死如归的他，在最后

时刻又将生命的灯草猛地燃起，用理想为人生壮行，以信仰向人民谢幕。

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：死亡孕育着成熟，最后的日子可以让你的眼界变得更为开阔，甚至会让你的见识超越你对生命的原有认知。

是啊，狱中文章多名篇。文天祥写出《正气歌》，谭嗣同挥就《狱中题壁》，方志敏创作《可爱的中国》。李卡呢？他把自己对家国命运的思考，对亲朋好友的嘱托，尽付“狱中书简”，由狱友郑超群的母亲秘密带出。

你看吧！看李卡慷慨赴死的意气吧：“最坏的（也是我感到最快乐的）场面会降临，我时时准备着，但最恼的就是不清情况而已。”“我的生死，我是置之度外，你不要为此而悲哀，千祈，千祈。”“我是随时准备那快乐的时刻——被杀戮到来，我是有此勇气的。不过，老实说，敌人也要对我的问题作周详的考虑，今天谁不清楚敌人，而敌人又何尝不了解他们自己？我有时默然的呼喊——‘有本领就杀吧!!! 看你行运到几时!!’”

你看吧！看李卡心系家国的情怀吧：“国共和谈，虽其方宽大为怀，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来谈，但大局如此，也许谈不成。什么力量亦不能阻碍人民的前进，谁有这么大的力量？谁敢，谁就被消灭的。”“好的日子是属于全人类的，海（注：指李卡）不会自私，有什么出乎你意料之外时，宜把过去的旧的放在事业的后头。”“国家事时刻在变，真快了。”

《学习时报》让理论之树长青

□ 梁鸿鹰

《学习时报》迎来创刊20周年了，这是一个让人向往生机勃勃的未来，足可以畅想与回望的机缘。

我常想，在这个星球上，是不是只有一份每周出三期的报纸以“学习”作为自己的名字，对此我不敢肯定，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能够与这样一份具有如此美好的名字，在任何时候都有充分理由阅读的报纸结缘，不管是对作者，还是对读者，都算是一种幸运和福分。

因为，学习是世界上最纯洁最彻底的事情，是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条件下都有充分理由去从事、去追求、去沉迷不悟的事情，学习，同样是世界上最少伪饰、成本最低、获得感最强的事情。

不过，对待学习这种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事情，不同的人有多种不同的态度，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，比如，有的人喜欢“述而不作”，有的人则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有的人既不“述”，又不“作”。

学习是写作的基础，是写作的条件，而且无疑，写作恰恰是一种最好的学习，写作使人谦虚，写作使人进步。但世间最好的东西往往就是最难得到的东西，就像美食最难制作，美酒最难酿制，美女最难追求一样。写作需要整理思想、锤炼语言、缜密思维，费脑力，费体力，费时间，有时候也依赖于“灵感”，不像说话张口就来，走路抬脚就能，吃饭张口就行。

但怎么能够让写作这种有难度的事情进行下去呢？需要爱好，需要毅力，需要意志，需要激励，有时候还偏偏更需要有人催促。按我的人生体会，报纸、杂志、出版社的编辑往往就是最称职的催促者，我们的不少文章不像水龙头里的水，可以不费多大功夫就可以流出来的，不少绝非主动写的，更不是“灵感”导致，而是编辑催出来的，逼出来的，甚至策划、启发出来的。那些富于责任感的编辑，是写作者与自己的懒惰作殊死搏斗的推手，是克服人性弱点的福星，是好文章的接生婆、助产士，当然，也可能是你灵感、思维、才气枯竭时的拯救者。

最初接触《学习时报》是因为我的好朋友、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，当他的《中国新教育风暴》《智慧风暴》《让我诞生》等作品接连面世的时候，受到了《学习时报》的关注，多次得到这家报纸的褒扬，当然，关注得最切近的人，是报社一位叫曹颖新的责任编辑，看得出来，他很看重与曹编辑保持密切的关系，事实上他们也相处甚欢，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。朋友的朋友往往就是朋友。王宏甲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，把我介绍给了这位性情直率、满嘴京腔的曹编辑，可能就是由于认识了曹编辑，我给《学习时报》写了那么一两篇稿子，登没登完全不记得了，反正她也不催，我也不急，不过，这样一来二去的，我和曹编辑算是熟悉了，过年可能还发短信。那个时候没有微信。

时间到了2013年，我第一次进入中央党校学习，书也读，讨论也踊跃发言，但就是不爱写，是懒惰，是没有思路，是没有题目，是没有精神。反正各种原因，这次在校期间我好像没有给《学习时报》写过什么，似乎有次见到曹编辑，或者她向我约稿，我希望她给我布置个题目，曹编辑给我说了几个，想让我针对阻碍当前文艺发展的一些“乱象”、障碍之类写篇文章，希望我自己开动脑筋，但我始终没有完成。后来碰着了，我又让她给我出题目，曹老师用很京腔的语言说了几句话，别的都忘了，就一句“不带这么着的”，我记住了。总之，她不布置题目我就不写，好像写是她的事情似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党校学习结业时每人都有一篇作业式的论文，写完论文后，我想起了曹老师，文字很长，而且我可能也懒得压缩吧，就电邮给了她。曹老师说文章长，自己定不了，不几日，她回话了：说文章给晚了，我也就再没有给《学习时报》投过稿。

时间又过了几年，可能是2016年吧。我爱写文章了，恰好曹老师也约我，

就发了几篇。很快，她好像转到了历史版，她把自己手头的作者介绍给了相关版面的编辑。

2017年我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，进入校园之后不久，曹老师就带着编辑上门约稿，从此，我在党校这个学习的地方，经历了边学习，边写作，边学习写作的过程。感谢《学习时报》的二审、三审和领导同志们，我那么多次地发表文章，基本上都是头条，两千多到三四千不等，频率非常高。我写了不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体会的文章，写了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文章，写了关于传统文化，关于读经典，古典诗词与当代文化等等以前很少写的题目，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，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，磨砺了我的耐心。这次党校学习是我一次难忘的记忆，毕业了，仍然时时想起，但我后来又忙了，又懒了，又不爱写了，而且慢慢想转到文学性更强的文体上去了，给《学习时报》写的就少了。

但对《学习时报》的关注并没有停止，《学习时报》与我们《文艺报》同刊期，也是偏重于理论评论，我们有面临的共同问题，需要克服相近的困难，《文艺报》需要向《学习时报》学习。作为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，《学习时报》担负着传播党的理论，引领全党学习的任务，政治性、专业性都很强，这份报纸视野开阔、富于担当，敢于发声，善于发声，让人进步，让人找到自己的不足，争取更大的进步。二十正当年，《学习时报》一定会让理论之树长青，一定会在推动全党的同志更爱学习、取得更大进步的事业中取得更多成绩。祝福这份好报纸，好阵地，她一定会越来越年轻。

（作者系《文艺报》总编辑）



相依相偎

张曙光 摄



既要『零距离』 还要『心贴心』

□ 中国华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增进和群众的感情，不仅需要“零距离”，关键还要“心贴心”。即使距离很近，心不相通，往往形同陌路，而心里相通、相融，就会团结一心，形成强大力量。增进和群众的感情，不是一道“选择题”而是“必答题”，而且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只有向前冲。

毛泽东曾经说过，应当“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。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，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”。只有把心交给群众，才能感受群众冷暖，才能体会群众疾苦，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战争年代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摧不烂、打不垮，就是因为与群众心连心，有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。现在，更要与群众情同手足、亲如兄弟。

把心交给群众，就是要做到与群众心里相通。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分量，不是空间距离有多近，而是心里有多近，心灵是否相通？心灵不通，心中几乎没有百姓，即使与群众近在咫尺却很难“心贴心”，貌合神离，最多只能是“粘”在一起或者“捏”在一起。只有心灵相通，才能从内心深处予以认可，才能如同鱼水而不是“油水”。杨善洲在市里、焦裕禄在县里，尽管距群众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，却与老百姓“心贴心”，主要源于他们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，与群众心息息息相通，没有任何隔阂，群众也愿意买他们的“账”。

把心交给群众，就是要做到与群众心里相融。干部和群众融为一体，不是表面的“粘贴”，而是心灵的融合。粘贴的只能是身体而不是心灵，心灵融合的是感情，是像焦裕禄“心

里只有人民群众，唯独没有他自己”那样的真挚情感，既不是作秀，也不是装腔作势。干部心里装着群众，自然就会把这种真挚情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，为群众办实事、出实招……也许这些事情小的可能不起眼，但，只要扎扎实实，坚持不懈，就会结出累累硕果。

然而，这些道理虽然浅显，却未必都能做得好。现实生活中，少数干部不仅心里没有群众，有的见到群众可能还害怕：一怕群众找麻烦。二怕群众提意见。三怕群众发牢骚。一些干部即使偶尔“碰见”群众，也是不冷不热地寒暄两句，心不在焉地问候两声，虽然看似“零距离”，实则有千里之遥，彼此之间好像有一座无形的“墙”。

去掉这堵“墙”，有时候并不需要太高的工作艺术，也并不一定非要做到惊天动地的成绩，而在于从点滴做起：从与群众的一次握手、一次聊天、一次劳动，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真正的温暖、真心的关爱、真诚的信任；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，以诚相待，干啥儿搭把手，心里憋屈聊聊天儿、解解闷儿……这样的感情会像火炉上的水壶一样温度越来越高，再坚硬的“冰块”也会被融化。因为群众的感情最朴素、最真挚，没有半点儿水分，也容不得有半点儿杂质。

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无数事实证明，只有“心贴心”，干部和群众才会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群众才会一心一意听党的话、跟党走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不断厚植执政的群众基础，党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